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辅 导 材 料

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
文艺理论教研组编

一九七七年一月

毛主席语录

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目 录

第一部分：历史背景1

一、政治形势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1

二、文艺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6

第二部分：内容概述14

“引言”14

“结论”18

一、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20

二、文艺如何为工农兵服务36

三、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47

四、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55

五、关于文艺界的整风运动68

第三部分：伟大意义74

一、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指路明灯74

二、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的战斗纲领76

三、批判修正主义的锐利武器78

第四部分：名词解释	80
封建文化	80
买办文化	80
大众化	81
梁实秋	82
周作人	83
张资平	84
文学艺术遗产	85
观念形态	85
启蒙运动	86
典型化	87
功利主义	87
为艺术而艺术	88
二元论或多元论	89
托洛茨基	91
真实性	92
艺术方法	93
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	93
内容和形式	94
人性论	95
暴露文学	97
杂文时代	98
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	99
虚无主义	99
法捷耶夫的《毁灭》	100

第一部分 历史背景

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这篇光辉著作，发表于一九四二年五月，是在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诞生的。关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和文艺战线的情况，毛主席在《讲话》中有一段简明的论述：“**现在的事实是什么呢？事实就是：中国的已经进行了五年的抗日战争；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抗日战争中的动摇和对于人民的高压政策；‘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运动——这个运动在二十三年中对于革命的伟大贡献以及它的许多缺点；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里面大批文艺工作者和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工人农民的结合；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工作者的环境和任务的差别；目前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中已经发生的争论问题。——这些就是实际存在的不可否认的事实，我们就要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考虑我们的问题。**”（以下凡引自《讲话》的引文，均不一一注明。）毛主席的这段论述，精确地概括了《讲话》发表的历史背景。

一、政治形势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

一九四一年六月，德国希特勒匪帮发动了侵略社会主义苏联的战争；十二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为

了反对法西斯的奴役，各国人民和一切反法西斯力量，结成了国际统一战线，展开了世界范围的反法西斯战争。在一九四二年，虽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还处于最困难的阶段，但是已接近了伟大的历史转折点。

这时，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进入了第五个年头。抗战以来，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各解放区和抗日根据地的军民，团结一心，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迫使日寇无力再作大规模的军事进攻，敌我形势正处在战略相持阶段。在这样的形势下，日本帝国主义者对蒋介石国民党采取了“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集中力量对付我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日寇纠集了百分之六十四的侵华兵力和几乎全部伪军，对我解放区和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扫荡”，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由于日寇方针的改变和国际法西斯势力的暂时嚣张，加重了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国民党反动政府在抗日战争中的动摇和对于人民的高压政策。国民党反动派进一步加紧了与日寇的勾结，极力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到一九四一年一月间，连续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蒋介石等反共顽固派，一方面公开调集几十万军队对我解放区实行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妄图困死抗日军民；另一方面又在“曲线救国”的口号下，秘密派遣数十万军队投降日寇，在日本军阀的指挥下进攻解放区，企图消灭抗日力量。因此，毛主席指出：“抗日的第五第六年，包含着这样的情况，即接近着胜利，但又有极端的困难，也就是所谓‘黎明前的黑暗’的情况。”^①为了争取胜利，中国共

^① 《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毛泽东选集》，袖珍合订本（下同），第836页。

产党和中国人民正经受着抗战以来最严酷的考验。

这种尖锐复杂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反映到党内，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王明一伙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激烈斗争。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确立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把党的路线转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是我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抗战头五年所取得的重大胜利，就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就是毛主席提出的“独立自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胜利。然而，王明一伙却配合日伪顽的反革命“围剿”，疯狂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加紧进行反党投降活动。

在思想和政治上，王明一伙提出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主张取消阶级斗争，反对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放弃“独立自主”的原则，并无耻地吹捧人民公敌蒋介石是所谓“不朽的民族英雄”，公开叫嚣“全国进步力量要团结在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政府的周围”，把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一九三九年，刘少奇抛出了鼓吹孔孟之道，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的大毒草黑《修养》，妄图从根本上改变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使共产党员“修”成向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屈膝投降的奴才。一九四〇年，林彪追随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抛出了《中国人民三年民族解放战争》这一黑文，无耻地吹捧卖国贼蒋介石是什么“最高统帅”、“政府领袖”，要我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人民政权和一切抗日力量“服从”、“统一”于以蒋介石为头目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司令部”。这一切充分暴露了王明一伙投降卖国、反党反人民的反革命丑恶嘴脸。

在军事上，王明一伙主张取消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要革命军队“统一”于蒋介石国民党，并疯狂反对毛主席人民战争的思想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大搞军事冒险主义，阴谋葬送人民革命力量。如一九四〇年八月，彭德怀背着毛主席，擅自调集了一百一十五个团共四十万兵力（约占我军总数百分之七十），在“保卫重庆”，“保卫西安”，“撑起蒋介石的腰”等反动口号下，沿着华北五千里长的敌后战线，向日寇进行所谓“主动的大规模的战役进攻”。这一严重的军事冒险行动，完全违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适应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妄图消灭我党军事力量的反革命需要，所以，博得了蒋介石的所谓“特电嘉奖”。

在组织上，王明一伙结党营私，大搞宗派主义，阴谋分裂我党我军，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王明就组织了以他为头子的反党宗派集团。一九三六年八月，刘少奇伙同张闻天，指使安子文、薄一波、杨献珍等六十一人叛变出狱，结成了一个长期隐藏在党内的大叛徒集团。抗日战争爆发后，王明一伙为了推行其机会主义路线，一方面千方百计地拉山头，搞分裂，把自己的死党安插在各个要害部门，一方面拒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党中央的战斗号令，把他们所控制的地方搞成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一九四一年一月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的重大损失，就是王明一伙推行机会主义政治路线和宗派主义组织路线所造成的严重恶果。

党内斗争的情况表明，遵义会议以后党内依然存在着尖锐的路线斗争。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毛主席发表了一系列文

章，对王明一伙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一九三七年毛主席发表了两篇具有伟大意义的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彻底批判了“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理论基础。然而，由于紧张的抗日战争和形势的急剧变化，机会主义路线的恶劣影响还没有能够在全党得到清算。同时，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不良作风及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又给机会主义路线提供了滋长的条件和活动的市场。为了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整顿党的队伍，肃清机会主义路线的恶劣影响，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加强党的团结和统一，增强党的战斗力，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毛主席在一九四二年亲自发动和领导全党开展了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①，即伟大的全党整风运动。延安文艺座谈会，就是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指导全党整风运动，毛主席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光辉著作。在这些著作里，伟大领袖毛主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建设的学说，进一步深刻地总结了党内路线斗争的经验，批判了孔孟之道等没落阶级的腐朽思想，批判了各种伪装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制定了整风运动的方针、政策、原则和方法，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②。

① 《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毛泽东选集》，第1008页。

② 《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770页。

经过整风运动，揭露和清算了王明一伙机会主义路线的反动实质及其恶劣影响，大大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显著地提高了广大党员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深刻地改变了党的面貌。全党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新的团结和统一，增强了战斗力，为夺取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奠定了巩固的基础。延安整风运动，在社会主义时期，仍然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二、文艺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

文艺从属于政治，又反作用于政治。政治战线的斗争，总是首先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反映出来。《讲话》发表时的政治战线的斗争反映到文艺领域内，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与周扬一伙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激烈斗争。

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指引下，群众文艺运动有了很大的发展。广大工农兵文艺积极分子，运用秧歌、墙报、通讯文学、木刻版画、活报剧、小戏曲等文艺形式，热情地歌颂火热的现实斗争生活，努力表现工农兵群众中的英雄人物，鼓舞人们同心同德地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作斗争。一九四〇年一月，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伟大领袖毛主席出席了大会，并作了报告。大会发表了宣言，强调要继承和发扬鲁迅的战斗传统，在抗日建国的总目标下团结起来，为反对暗藏在抗战营垒中的妥协投降分

子，反对文化上的倒退、复古活动，争取对日作战的伟大胜利而斗争。

然而，以周扬为代表的一小撮混在革命文艺队伍中的反革命分子，紧密配合王明一伙的机会主义路线，在文艺界刮起了阵阵反党黑风，推行了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特别是一九四〇年以后，他们更与日伪顽向解放区的大举进攻遥相呼应，一个个跳出来，“**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疯狂向党、向边区红色政权进攻。周扬充当了反党急先锋和主将的角色。一九四一年七月，他首先抛出了反党动员令《文学与生活漫谈》，把矛头直接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煽动一切牛鬼蛇神起来同共产党“格斗”。在周扬的煽动下，一小撮隐藏在延安文艺界的叛徒、特务、托派和其他反革命分子，纷纷跳出来“格斗”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丁玲的《在医院中》、《三八节有感》，肖军的《论同志的“爱”与“耐”》，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等反党大毒草，争相出笼。这批毒草在恶毒诬蔑解放区“阴森可怖”，疯狂攻击党领导的红色政权“到处是无声的压迫”的同时，还贩卖了一整套的反动文艺思想。例如，鼓吹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和“人类之爱”，把这种超阶级、超政治的“爱”说成是文艺创作的出发点；宣扬“创作自由”，挑拨文艺工作者和党的关系，要党“保障他们的艺术创作的独立精神”；胡说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黑暗”，只有刻画黑暗的作品，才是“伟大”的作品；叫嚷“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等等，妄图把文艺变成他们向党进攻的工具。

周扬之流对解放区和共产党的诬蔑同进攻，起了日本帝

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所不能起的恶劣作用，因而受到了敌人的赏识和欢迎。国民党特务机关视这批毒草为至宝，认为它提供了解放区的所谓“沉痛和凄惨的境况”，喊出了某种“反抗的声音”，是可以用来进行反共宣传的材料。西安国民党特务组织还把丁玲的《三八节有感》改编上演，并翻印了这些反党黑文，题为《关于〈野百合花〉及其他》，在国统区大量散发，作为反共反人民的炮弹。

周扬一伙的上述反动谬论和反党行径，不是孤立的，也并非偶然的。它是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文艺战线上的具体表现，也是“五四”以来文艺界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和发展。

在“五四”以后的思想文化战线上，文学艺术是一个重要的有成绩的部门。“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①以鲁迅为旗手和主将的文化新军，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使中国的封建文化和适应帝国主义侵略的买办文化的地盘逐渐缩小，力量逐渐削弱，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革命文艺的发展立下了伟大的功劳。

但是，文艺界的两条路线斗争却始终是非常激烈的。“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斗争，本质上就是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也是“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②。随着这场革命运动的不断深入，一部分人——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继承了五四运动的革命精神，继续前进；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道路上去，向后

①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658页。

②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660页。

倒退，向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发动一次又一次的反攻倒算，力图为孔老二及其一套黑货翻案，进而和帝国主义文化、中国封建复古文化同流合污。在十年内战时期，革命的文学艺术运动有了大的发展，战胜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取得了文化革命的深入。这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一些革命文艺工作者，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专制主义英勇斗争的胜利，也是同王明、刘少奇及其追随者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等“四条汉子”所推行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坚决斗争的胜利。到了三十年代的初期和中期，由于周扬等“四条汉子”窃据了左翼文艺运动的领导权，斗争就更为尖锐复杂。在十年内战时期，他们疯狂围攻鲁迅，积极推行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抗日战争爆发后，又紧跟王明、刘少奇一伙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提出了“国防文学”这个资产阶级口号，背叛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大写卖国文学，国民党文学，向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蒋介石屈膝投降。伟大的共产主义者鲁迅，发扬了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带领战斗的左翼文艺工作者，与王明、刘少奇、周扬之流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根据毛主席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在其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光辉思想，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的口号，英勇地捍卫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代表了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正确方向。在两个口号的大论战中，林彪死党陈伯达扮演了极为可耻的角色。他不仅大肆鼓吹孔孟之道以及一切没落阶级的腐朽思想，叫嚣要搞所谓“新启蒙运动”，要写“人的文学”，而且以折中、调和的伪善面孔，一方面高喊“休战”，一方面

又叫嚷“‘国防文学’是驳不倒的”。“四人帮”中的狗头军师张春桥在当时化名“狄克”，写了《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的黑文章，鼓吹“国防文学”和“国防文学底路线”，肆意攻击鲁迅，借文艺批评为名，格杀宣传抗日的文艺作品，扮演了一个阶级投降主义者和民族投降主义者的可耻角色。鲁迅当即写了《三月的租界》予以反击，拆穿了张春桥向敌人献媚缴械的鬼蜮伎俩。大野心家江青更是身体力行，在“国防电影标本”《狼山喋血记》中粉墨登场，以其丑恶的表演博得国民党反动派的喝采，并且肉麻地吹捧汉奸戏《赛金花》，为争演汉奸妓女赛金花出尽洋相。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妄图否定鲁迅的正确方向，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周扬之流张目，替王明、刘少奇一伙的机会主义路线效劳，充分暴露了他们的反革命政治骗子的凶恶嘴脸。

“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运动，在二十三年中，虽然是一个重要的有成绩的部门，但是也有许多缺点。主要的缺点是：文艺“为什么人服务”和“如何去服务”这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没有得到明确彻底的解决。“五四”时期，提出过“平民文学”的口号，但是当时的所谓“平民”，实际上还只限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因此，这个文化运动，当时还没有可能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十年内战时期，在左翼文艺运动内部，虽然也提出过“文艺大众化”的口号，并进行了长期的讨论，但由于没有抓住“**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这个关键问题，而只在文学形式上兜圈子，因此收效不大。特别是当时窃踞左翼文艺运动领导地位的周扬等“四条汉子”，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以贵族老爷的态度对待人民大众，

叫嚣“大众化”就是由具有“目的意识性”的知识阶层去“教化”大众，“去和大众的无知斗争”。他们的所谓“大众化”，实际上是“化”大众，即用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反动思想毒害大众。所以，“为什么人服务”和“如何去服务”的问题，仍未得到明确彻底的解决。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许多文艺工作者从国民党统治区和敌占区来到延安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投身到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伟大革命实践中去，与工农兵相结合，思想立场得到了一定的改造，写出了一些为抗日战争服务的文艺作品。但是，这许多文艺工作者，还不了解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工作者的环境和任务的区别。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立场和世界观还没有得到彻底改造，“**还有很多的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的缺点。**”特别是在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艰苦困难的斗争形势下，加上以周扬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影响，所以，思想上产生了很大的混乱，在文艺工作中发生了许多争论。在当时的文艺队伍中，表现出如下一些突出的问题：

第一，对理论学习、生活实践、艺术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缺乏正确的认识。有的人片面强调艺术实践，忽视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深入工农兵实际的重要意义；有的人把理论当作教条，不是用来指导自己的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有的人甚至把学习理论和文艺创作对立起来，说什么“最近脑子里装满了革命理论，一首短诗也写不出来”。这样，就必然迷失正确的政治方向，陷入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泥坑。

第二，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关门提高。他们对工农兵

群众的实际需要一无所知，把普及和提高对立起来，轻视群众文艺和普及工作，强调“面向全国”，搞所谓“正规化”，关在艺术院校里“提高”，在延安大演古戏、洋戏和大戏，同当时的伟大革命实践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引起了广大工农兵群众的强烈不满。

第三，把文艺创作变成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一些“**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的作家艺术家，只是在小资产阶级中找朋友，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面，而对工农兵及其干部则不熟、不懂。特别是由于他们的思想感情还没有和工农兵打成一片，所以，即使写工农兵，“**也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的作品充满了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同情，甚至连他们的缺点也加以欣赏和鼓吹，完全成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自我表现。

上述种种情况表明，延安文艺界当时存在的中心问题，就是毛主席指出的“**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为了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清除王明一伙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恶劣影响，粉碎周扬之流的猖狂进攻，批判修正主义的文艺黑线，纠正革命文艺队伍中的不正之风，明确彻底地解决文艺界长期存在的“为什么人服务”和“如何去服务”这一根本、原则的问题，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完成民族解放的伟大任务，在毛主席的亲自关怀和领导下，于一九四二年五月在延安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大楼会议室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文艺座谈会，开展文艺界的整风运动。

座谈会历时三周，大会开了三次。开会的第一天（五月二日），毛主席作了启发性的报告，这就是《讲话》中的“引

言”部分。毛主席讲话后，与会人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根据讨论的情况，会议的最后一天（五月二十三日），毛主席作了总结发言，这就是《讲话》中的“结论”部分。

《讲话》就是在这样激烈的两条路线斗争中诞生的。它是一部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光辉文献，是一切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都应该认真学习的经典著作。